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第三分册

(美) 包华德　主编

沈自敏译

林东民校

中　华　书　局

1981年4月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第三分册

（美）包华德主编

沈自敏译
林东民校

（征求意见稿）

1981年4月

内部参考　注意保存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第三分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

•

中华书局排印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北京体育报社印刷厂印刷

•

1981年4月印刷　　定价0.60元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编印凡例

一、编印《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目的在于组织协作，征求意见，反映工作进展情况。

二、《丛稿》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负责编辑。

三、《丛稿》专登有关中华民国史资料一类的稿件，供历史教学、研究工作参考。每辑字数不定。

四、所有中华民国史初稿及其所附资料，一般都先在《丛稿》登载，广泛征求意见，然后改为定稿。但《丛稿》登载过的稿件，将来《中华民国史》一书及其所附资料不一定全都编进去。

五、欢迎投稿，但只限于中华民国史及有关资料。

六、欢迎对《丛稿》提出批评意见。

七、译稿如引用，请核对原文。

目　　录

陈布雷……（1）
陈绍宽……（3）
陈树人……（5）
陈文宽……（7）
陈　仪……（8）
陈寅恪……（13）
陈　垣……（16）
郑振铎……（19）
郑孝胥……（23）
郑天锡……（27）
郑毓秀……（31）
程　潜……（33）
诚静怡……（38）
成舍我……（40）
程天放……（43）
程砚秋……（47）
齐燮元……（49）
江长川……（52）
蒋经国……（54）
蒋方震……（61）
蒋介石……（67）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陈布雷　　原名：陈训恩　　字：彦及　　号：畏垒

陈布雷（1890.12.26—1948.11.13），从1935年起到1948年一直是蒋介石的心腹助手，为国民党、国民政府拟订政策。先前，他曾任《商报》、《时事新报》编辑。1939年任最高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1948年自杀身死。

陈布雷，浙江慈溪人，早年从塾师读书。1906—1911年在杭州浙江高等学校读书，对时事政治渐感兴趣。在学时，因为陈布雷的圆脸象一块面包，有一同学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面包”。从此他以英文“面包”的汉语译音“布雷”作为他毕生的名字了。

毕业后，陈在上海戴季陶主编的著名的《天铎报》当了一段短时期的记者。1912—1920他断断续续的在宁波、绍兴中学教书。1914年他父亲去世后，作为长子的陈布雷暂离教职，回家照料家务。

1920年他去上海商务印书馆参加编译《韦氏大学字典》。几个月后，他重操新闻职业，担任《商报》主编。此后六年中，他和潘公展等人协力办《商报》，使该报成为上海的著名报纸之一。那时正是政治大动荡的年代，陈布雷所写的文章，积极支持国民革命运动及其集中在广州的革命势力，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商报》原来只是作为上海商界喉舌的报纸，但因为它密切注意时事，所以在学生和知识界中的声誉日益增高。1925年孙逸仙逝世时，陈布雷写了一篇专文表示悼念，而其他一些报纸对此毫无表示，有的甚至加以嘲笑。《商报》还十分关心北伐军的进展，并热心报导了国民革命军攻占武汉的消息。

1926年，那时陈布雷年约三十六岁，开始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他和潘公展一起去江西省会南昌，报导国民革命军的情况。当时蒋介石的临时总司令部设在南昌，蒋介石很欣赏陈布雷文笔流利的社论和《商报》对国民革命的大胆同情，因此邀请陈布雷留在南昌为他起草政治文件和宣言。于是陈布雷加入了国民党。

1927年春，他在张人杰任内的浙江省政府短期工作。5月，他去南京进入由胡汉民、丁惟汾、陈果夫主持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宁汉分裂后，陈布雷于1928年回上海任《时事新报》主编，为时达两年之久。同时，他继续协助蒋介石，两次陪蒋去北京，为蒋起草政府文件。

1930年陈布雷在南京任教育部次长，1931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次长，同时曾两次（一次在1930年，一次在1932—1934年）任浙江省教育委员。1934年，陈布雷辞去浙江的职务去江西，成为蒋介石的随从人员，他在蒋的南昌行营任职，1935年，他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厅主任，他在这个岗位上作为蒋介石的心腹干了达十多年之久。

据陈布雷本人回忆，1934—1940年间，是他著述最多的时期，他当时的文章，把中国的情况宣告国内外，提高蒋介石作为战时领袖的政治地位。由于中日关系恶化，陈布雷的责任更重了，蒋介石充分利用陈布雷的才能阐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政策。1935年初，陈布雷写了一篇题为《敌乎？友乎？》的文章，以此警告日本，它的扩张政策永远征服不了中国。这篇文章发表在《外交评论》上，笔名是徐大霖（徐是陈布雷手下的人，是徐树铮的儿子。徐树铮是亲日派要人段祺瑞的同伙人）。这篇文章促请日本从速决定与中国为友还是与中国为敌，而且提醒日本当局应该记住国民政府之反共超过反日，又提醒说国民政府必将在战争中日益增强。这篇文章的论点引起东京的文官政府的注意，他们认为可以通过中日协商，在反共和经济合作的基础上控制中国，并不需要非征服中国不可。但是日本军方人员，特别是在满洲的日本军人并不喜欢这篇文章，他们以在华北和内蒙着手成立分裂的伪政权作为回答。

1936年陈布雷任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这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之间的一个联系机构。当年12月西安事变时，陈布雷所负责任更为重大。他辞去中央政治会议中的职务。1937年5月他因患神经衰弱症，不得不辞去一切职务去杭州休养。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他再度在蒋介石那里工作。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汉口扩大，张群任秘书长，陈布雷任副秘书长。陈布雷为蒋介石起草大量文件，并积极筹建三民主义青年团。

1938年下半年，国民政府撤退到华西，陈布雷继续担任蒋介石的机要秘

书，起草重要的政策声明和文告。1939年在重庆成立最高国防委员会统理军政大事，陈布雷所任副秘书长，秘书长一职先后曾由张群、王宠惠担任。对日战争时期的需要，以及1945年后国民党的政治处境恶化，用尽了陈布雷的心计。尤其使他深为关切的是共产党势力的增长和对蒋介石的批评的加剧，他愈来愈感到他的才能全都白费了。1948年11月，他服大量安眠药在南京了却余生，留有致其家属、致蒋介石及生前友好的遗书。1948年12月葬在杭州郊区的一个风景区，那里曾是他准备退休后寓居的地方。

他五十岁以前的自传见之于《陈布雷回忆录》一书，该书于1939年在上海出版。该回忆录系日记体裁，用陈布雷的手稿影印出版，书中还记载了有关当时的时局、机构和人物的丰富材料和见解。

陈布雷作为一个记者在现代中国报界中是很出名的。他的兴趣在新闻界，他经常担任蒋介石的新闻秘书的角色，同时也是蒋的心腹助手。

陈布雷具有保守、爱国、忠诚、服从、维护传统道德的品格。他把撰文的雄才同善于细心体察他上司蒋介石的思想感情很好结合起来。这些特点，又加上他的为人正直，使他在近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占有显著地位。

陈绍宽　　字：厚甫

陈绍宽（1888—），福建籍的海军军官，1930—38年任海军部长，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1949年后为北京政府工作，任国防委员会委员。

陈绍宽福建闽侯（福州）人，出身于士绅家庭。福建是当时中国训练海军的主要基地，因此陈绍宽在受最初的旧式教育后就倾心海军事业，这是不足为奇的。他进福州附近的马尾水师学堂学习，于1907年毕业后，在海军服役，终于获得了上校军衔。

1916年，陈绍宽任中国驻伦敦公使馆武官，他利用这个机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学习英国海军作战技术。大战结束时，他担任出席1919年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的海军代表。同年，他代表中国在伦敦出席国际航道会议。

1920年，陈绍宽由英国回国后，仍在海军界服役，负责训练海军学员。1920—1923年他先后指挥教练舰“通志”号、教练驱逐舰“英士”号。1925年提升为海军中将，1926—1929年任中国海军第二舰队司令。

1927年，北伐军抵南京，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陈绍宽率领他的舰队投向新政府，任军事委员会委员。1927年秋，南京政府征伐控制武汉的唐生智，陈绍宽率舰队参加战斗。平定唐生智后，1928年春中央政治会议在武汉设分会，李宗仁为主席，陈绍宽为委员。1929年陈辞去第二舰队司令职务，任海军部政务次长，1930年在南京任海军部长。在1935年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绍宽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翌年他出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

1937年4月陈绍宽被任命为副特使去伦敦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特使为孔祥熙。1937年7月中日冲突发生后，陈赶回中国。上海与南京之间的长江水道在江阴地区进行封锁。1937年9月22日，日本空军进行轰炸，一举摧毁了全部中国舰队。陈绍宽随南京政府高级官员撤往武汉。要想在中国战场上拖住日本军舰向西行动，当时只能采用设置水雷这一办法，这最多不过使日军的前进速度推迟而已。自从1938年武汉失守后，中国海军已经没有可用的船只了。海军部取消，而代之以成立了一个仅有其名的海军司令部，以陈绍宽为司令。当中国的首都迁到重庆，日本海军在宜昌被阻，因为长江上游不能通航。中国海军官兵只能在陆地上操演，他们的炮位设在宜昌江岸。在战争期间，陈绍宽除了担任海军司令这个职务外，还是最高国防委员会的委员。但这些职位不过徒有其名而已。

1946年6月，国民政府搬回南京，战时的军事机构解散。行政院下设立了国防部主管一切军界事务，包括海陆空军。陈绍宽退休回老家福建。桂永清接替了海军司令的职务，他原是陆军军官，曾于1937年去伦敦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的中国代表团中的陆军代表，这真是巧合。

在战后几年中，陈绍宽一直退休在家，他并未公开表示过同情共产党的事业。然而1950—1954年他担任了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他于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9年又当选为二届人大代表。1954年后，他还担任了福建省政府副主席，1959年他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同年，当选为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一组织的参加者是那些在1949年时背叛国民党投向新政府的国民党内的反对派。

陈树人

陈树人（1883—1948.10.4），反满革命家，为孙逸仙及其事业进行工作，1916—22年任国民党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党务主任。1923年任国民党总务部部长，直到1927年止，他在广东省政府担任过多种职务。1932—1948年任国民党侨务委员会委员长。

陈树人广东番禺人，出身于富裕的文人家庭。他受旧式教育，具有诗人、作家、艺术家的才华。他是清末广东名画家居廉的得意门人。后来和居廉的女儿若明结婚。

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陈树人开始卷入革命圈子。他在政治上是比较模糊的，不过支持反满的事业而已。1903—1904年，他在香港出版的由郑贯公办的革命报纸《广东日报》工作。1906年，他应邀参加由刘师复和谢英伯在香港出版的另一反满报纸《广东日报》工作。1905年，他因与冯自由的朋友关系加入了同盟会，但他与孙逸仙并无个人接触。

陈树人虽然已是一个有造诣的中国画画家，而他仍在1911年前去日本学艺术。1911年武昌起义后，他曾短期回国，不久携其全家去日本。1916年前，他在东京的一所美国教会学校立教大学读书，又在横滨一所中国学校教书。冯自由和陈树人是莫逆之交，冯当时在美国为孙逸仙的事业募款，他是旧金山的《民国杂志》的主编，《民国杂志》是面向北美华侨的国民党机关报。冯自由因为活动很多，1915年请陈树人为他在东京编这份杂志，1915—1916年间，陈承担了这项工作，他用笔名夏怀策（译音）撰写社论。

从1914年组织中华革命党起到1923年孙逸仙在广东建立据点这十年间，孙逸仙特别注意在华侨中发展党的事业，尤其是在北美。1916年经冯自由推荐，孙逸仙任命陈树人为加拿大党务负责人，他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华侨中积极开展

党的工作，达六年之久，为孙逸仙的事业筹募经费和开展宣传联络工作。1917年他担任英属哥伦比亚的维多利亚城的《新民国报》的主编。

1922年陈树人回国，被指派为上海九人委员会委员，委员会负责起草孙逸仙创办的党的改组计划，其他的委员有陈独秀、丁淮汾、茅祖权。陈树人在上海党内的职务是总务部次长，1923年1月又提升为部长。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开始和共产党合作，另一批人得势，陈树人在党内贬入从属地位。1924年他在广州和汪精卫结为朋友，他们关系密切，直到1939年汪精卫和国民党分裂。1923年到1927年间，陈树人在广东省政府工作，他四次任民政厅长，两次代理省主席，又担任国民政府秘书长，由于他在广州从政廉洁奉公，同时代的人们对他的印象很好。

当共产党人在1927年12月控制广州，建立短暂又很快就流产的广州公社时，陈树人在广州的政治生涯从此告终。1928年到1931年间，由于他和汪精卫的友谊，以及他和国民党内汪精卫派的联系，他就成为蒋介石统治下的南京政府的一个“不受欢迎的人”。1930年，陈树人出席在北平召开的国民党扩大会议，那时汪精卫在军事上联合了冯玉祥、阎锡山公开对抗南京当局。1931年12月，陈树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32年任侨务委员会委员长直到去世。陈树人作为广东人，三十年代初期，与国民党内的西南派常在一起，和胡汉民、陈济棠等领导人亲密无间。

1939年，汪精卫和蒋介石破裂离开重庆，汪精卫的私交中有少数人拒绝支持汪的行动，陈树人是其中之一，他仍留在战时首都重庆。陈树人的党的侨务委员会委员长的职位给予他只是名义而并无实权。

陈树人只是国民党的一个挂名官员，战争年代，他在重庆写了很多诗，后来私人出版诗集《专爱集》或《战尘集》。陈树人的诗篇歌颂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国英勇战士以及对日本统治下沦陷区的怀念。有些文人在他的诗句中觉出了他对汪精卫的缠绵深情。

陈树人在1945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这大概是对陈树人忠于重庆的一项奖励。陈树人在1945年随国民政府返回南京，由于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在战后退出了政治舞台专心致志于绘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他原想在广州附近的风景区辟一画室作为隐退之处，但1948年10月突然逝世。

在二十年代，广州的国民党官员把子弟送到苏联深造之风盛行一时。陈树人的儿子陈甫（译音）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但回广州后，被认为是共产党而被捕处死。

陈文宽

陈文宽（1913.4.13—）西文名蒙恩，飞行员，协助测定至印度的驼峰航线。他从新疆作穿越喀喇昆仑山谷到达印度的初次试航。中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及其他高级官员去各地视察时，他为他们驾驶飞机。1950年他在台湾创办福新航空公司。

陈文宽幼年的情况不详。他生于广东台山，早年就去美国读书。1932年毕业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寇的斯莱德飞行学校。1933年回国进中国航空公司，这是1929年创办1930年改组为中美合办的企业。陈文宽当该公司的副驾驶员，当时只有美国人才能当正驾驶员。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美方人员离开中国，陈文宽和其他华方人员提升为正驾驶员职位。陈文宽战争期间任该公司营运副经理，以后任营运经理，最后任副董事长。

1942年，军事当局决定开辟一条从印度到中国运输物资的航线，中国航空公司得到美国空军的支助，负责开辟由阿萨姆的定贾到云南昆明的那条著名的驼峰航路。这一航路需要二万五千英尺的飞行高度越过喜玛拉亚山的危险的山脉。陈文宽是参加这次危险而重要试航的中美驾驶员之一。

驼峰航线于1942年因日军进攻印缅边境而受到威胁，因此需要另找一条从印度到中国的航线。军事当局考虑由印度西北部经喀喇昆仑山飞到新疆的可能性。1942年7月，中国空军由陈文宽驾驶C—54运输机组织第一次试航。他们从重庆出发，经兰州到新疆乌鲁木齐，由乌鲁木齐经库尔勒、叶尔羌，飞过喀喇昆仑山的峡谷到达印度。这是一次精采的飞行，它要飞越海拔二万八千二百五十英尺的世界第二高峰哥德温奥斯汀山。

1943年间，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大多被日本人炸毁。陈文宽、林达光和少数飞行员只是驾驶剩下的供高级官员用的座机。陈文宽经常为蒋介石和蒋夫人驾机视察西北、西南各地。他又与在华的美国当局合作，为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机密使命驾机飞行。1945年2月，陈文宽驾机载戴笠、海军少将梅乐斯到内蒙绥远的陕坝某地与傅作义将军会面。因为那里没有机场，他就在冰河上降落，会晤以后，他又在该地区的日军可能袭击之前平安载客飞回。

1945年底，陈文宽由中国航空公司转到中国空运公司，任副总经理。中国空运公司是改组中德合办的欧亚航空公司而成立的，那时只有十架飞机。经陈文宽的努力，购买了中国各战场的剩余运输机而成为亚洲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1948年4月，他载运十四名中外记者飞越青海的积石山，从飞行高度证明积石山没有一个山峰超过二万五千英尺，从而否定了有一个美国商人所声称的积石山有一山峰高逾额菲尔士峰（即珠穆朗玛峰）。

1949年共产党人取得政权，中国空运公司留在大陆上的飞机落入他们的手中。陈文宽和该公司的其他官员去台湾。1950年，创办了福新航空公司，在台湾与沿海的金门马祖之间飞行。1951—55年，他担任台湾海峡的海空救护工作。1955年8月他驾水陆两用机在险海里救出六名跳伞飘泊大海的飞行员。同年，他又在毗近共产党滩头阵地的汕头海面救出一名跳伞入海的国民党战斗机驾驶员。

陈文宽是一个勇敢的驾驶员，他持有在不利条件下飞行的罕见记录。他的高超技术和勇敢精神使他成为喷气式飞机出现前中国杰出的飞行员之一。

陈　仪　　字：公侠

陈仪（1883—1950.6.18），福建省主席（1934—41），浙江省主席（1948—49），1945年后的台湾第一任中国政府行政长官。在一次遍及台湾全岛的起义危及他的统治时，他残酷镇压了台湾岛民。他因洽谈上海起义投向共产党，被认为是共产党的同谋人而处死。

陈仪，浙江绍兴人。在清代，绍兴以出师爷闻名。所谓师爷是为中国各地

各级政府官员充当个人秘书的人物。陈仪选择军界工作，这在绍兴是不多见的。他到日本学习，于1907年在日本士官学校第五期毕业。他在日本时与日本妇女结婚而成了一名亲日分子。他毕业后立即回国，在浙江军界工作。

1911年革命爆发后，陈仪很快投入革命运动。当浙江省宣布独立，成立临时政府时，陈仪任都督总参议，军政司长。1912年民国成立后，又重回军队，二十年代初，他升任浙军师长。

1924年孙传芳由闽入浙，逐走浙江省长卢永祥。驻浙闽边境浙军陈仪师的一个团的倒戈加快了孙传芳的胜利。陈仪和当时浙江军界要人夏超图谋推翻卢永祥。孙传芳完全控制了浙江后，任命夏超为浙江省长作为报酬。孙传芳趁胜向江苏进军，以夺取繁华的都会上海为主要目标，因此在1925年与奉军开战，陈仪率领此次讨伐军中的一支部队，孙传芳军获全胜。1925年10月，奉军及其盟友鲁军被赶回到北方。孙传芳借口徐州为战略要地，任陈仪为徐州警备司令，陈仪于1925年末率领其部队由浙江去徐州上任，事实上，孙传芳的根本目的是在分散浙省地方部队以免他们携手反对他本人。

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偶然的事，对陈仪的最后结局有间接影响。早在1925年，有一个年轻的浙江同乡汤恩伯想投身军界，他千辛万苦得到一位军界权威的介绍进十八期日本士官学校，又苦无盘缠前去报到。汤恩伯向素不相识的陈仪求援，出乎汤的意料，陈仪竟毫不迟疑允予资助，汤恩伯乃得进入士官学校，汤十分感激陈仪对他的恩德。但陈仪轻信早年私谊，措置失当，最后竟至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1926年当孙传芳巩固了地位自任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总司令时，广州国民政府正誓师北伐。北伐军进军神速，1926年底，孙传芳无法避免与革命军直接交锋。他手下的浙江军人心神不安，显示出倒戈迹象。浙江首领之一周凤岐最先投向革命阵营，率军由安徽返回浙西进攻孙传芳。浙江省长夏超试图借口宣布浙江独立独霸全省，他向陈仪提议采取反对孙传芳的联合行动，并将以省长职位为酬谢，他本人则准备趁机取得更高地位。陈仪即向孙传芳告密，孙传芳预先制止了这场叛变。孙传芳为安抚浙江人心，允以浙人治浙，并作为对陈仪及时告密的酬谢，任命陈仪为浙江省长。1926年10月，陈仪就任，12月把他

在徐州的军队调回杭州。

国民革命军的部队进展迅速，不久就接近浙江省会，陈仪认为这是见风驶舵的时候了，他与蒋介石取得了联系，1926年12月17日，蒋介石任陈仪为国民革命军十九军军长。但陈仪当时并无表示，因为他打算在浙江建立一个自治政府，等待形势进一步的发展。而孙传芳迅即派兵到杭州，解除了陈仪一部分军队的武装，陈的余部逃往绍兴，陈仪本人被逮往南京，不久获释去上海。1926年12月30日，从孙传芳那里逃出来的陈仪的浙江第一师余部在绍兴正式组成了第十九军，在成立这支新的部队时宣布陈仪为军长，当时他本人并不在场。

由于北伐军继续迅速进军，孙传芳预感到他已不能固守浙江了，于是决心往北在江苏找到一处立脚地进行抵抗。1927年2月19日，国民革命军进占杭州，3月1日，成立浙江省临时政治会议，张静江为主席。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进占南京，一个月后又在南京成立了新的国民政府，那时陈仪还退居上海。陈仪善于见风驶舵的本能又施展出来了，他通过葛敬恩的介绍表示愿为蒋介石效力。葛敬恩是陈仪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窗，与蒋介石关系密切，陈仪和蒋介石早期的联系就是通过葛敬恩这个中介人。1929年，陈仪在国民政府机构里开始了他的新的历程，起先在南京任军政部兵工署长，以后升任军政部总务次长，1931年，他擢升为军政部政务次长。

1933年底，陈铭枢、李济深以十九路军的支持发动福建事变，这次反对南京当局的行动是短命的，在国民政府的强大军事压力下很快就于1934年初溃败了。在扑灭福建事变的战斗中，国民党军队师长汤恩伯起了重要作用。福建事变平定后，陈仪被任命为福建省主席，在职八年之久，直到1941年日军占领福州。陈仪在福建任内，虽受到严厉抨击，但陈仪由于得到最高权威（即蒋介石）的信任而安然无恙。

陈仪在担任福建省主席职务中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与闽籍华侨领袖陈嘉庚的长期不和。陈嘉庚因创办和支持厦门大学而闻名全国，他又经常鼓励海外的福建籍华侨在福建投资发展本省经济。陈仪初任福建省主席时，对海外华侨投资寄以极大希望，认为这对他治理福建大为有利。但是，那时陈嘉庚在新加坡的

企业失败，他又未能促使他的朋友们投资发展福建经济计划。陈仪很感失望，他在一次讲话中大肆贬责福建的海外华侨，他说福建人盼望他们海外的同乡帮助建设家乡，可是事实上那些并无海外华侨可盼求的省份倒是干得更好。这次讲话使陈嘉庚大为恼怒。

1940年，任职华侨筹赈祖国代表大会主席的陈嘉庚应国民政府之邀，率领代表团回国访问，他最后又在原籍福建逗留了一些时间，陈仪对他不得不略为谦逊，但是陈嘉庚对福建的情况仍作了大胆坦率的批评，他直率地对陈仪说，报导中所传的弊政已为他的亲眼目睹所证实。陈嘉庚回到东南亚后，将福建的情况公诸于世又在福建海外华侨中发动了驱逐陈仪的活动，并向蒋介石呈文但无回音。陈嘉庚又向国民政府主席福建人林森呈文，据说林森个人曾与蒋介石谈过这件事，但是依然没有回音。

陈仪仍能获得重庆最高当局的信任，但是这时发生了一些因素使他连任多年的福建省主席职位受到影响。1941年，日本占领了从江苏直到福建的全部沿海地区。陈仪既是有名的亲日派，深恐南京汪精卫敌伪政府会利用陈仪的地位，同时又由于战局紧迫，需要任命一个军官去担任这个职务。1941年8月，国民政府任命刘建绪继陈仪为福建省主席。

陈仪离开福建时并未丢失脸面，他被提升为行政院秘书长，当时的副院长为孔祥熙。陈仪在新的职位上又牵涉了一些事件使他的同事们对他并不爱戴，一年后他就离去这一职务。

战争的结局已很明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领导人以收复日军占领的中国土地为国策的主要目标，台湾归复中国，是1943年11月开罗会规定的盟国目标。重庆的国民政府当局，正计划收复台湾，订定了时机一到就派人到台湾去的训练计划。陈仪被任命为从日本手中收回台湾时的第一位正式中国代表。陈仪被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有与日本打交道的经验又在福建长期担任省主席，福建是大陆上与台湾最邻近的省份，又是台湾岛上大多数居民的故乡。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秋初，国民党军收回台湾的统治权。国民政府任命陈仪为省行政长官，这是在正式的省政府成立前常用的职称，他兼任警备司

令。陈仪的老朋友葛敬恩任省府秘书长。1945年10月25日，陈仪到台北，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这一日就被正式规定为台湾光复日。

台湾经日本五十年统治，给中国留下了远胜大陆各省的教育普及、工业发达的繁荣地区。但是他们憎恶殖民统治欢迎和祖国重新统一。然而开始时的那种乐观情绪迅即消失，在专横的军事控制下，台湾人民无法表达意见。由于台湾经五十年日本的统治，地位特殊，需要不同一般的处理，因此，陈仪被赋予特殊权力。国民党官吏曾被台湾人民当作解放者来欢迎，但是很快就发现他们是一班恬不知耻的贪官，他们比以前的日本统治者更狂妄自大而行事无能。群众的不满迅即高涨，1947年2月28日愤怒达于顶峰，在台北发生了巨大的群众示威游行。国民党开枪射击游行群众，死多人，全岛暴动势将发生。陈仪采取了残酷的军事镇压，数千台民被屠杀，其中包括了所有受过现代教育有办事能力、政治上老练的小团体的领导人。蒋介石面对这一严重危机，立即解除陈仪职务派白崇禧前去台湾力图安抚，成立了正式的省政府，1947年4月任魏道明为台湾省主席。

陈仪仓促离台回上海。他在短期消声匿迹另候新的任命。1948年浙江省主席沈鸿烈因与本地国民党领导人不和而辞职，同年6月，南京当局宣布任命陈仪为浙江省主席，这使一惯愤世妒俗的政治圈子内的人士大为惊讶。

陈仪于1948年7月1日就职，他依然视若无人。他在就任后四个月内，全省县长除十个人以外，全部都撤换了，这件事很快引起公众的注意，甚至在数届省主席管辖下当了二十多年的杭州老市长周象贤也被撤换了。同时，陈仪任用了不少新人物，其中有政治上很成问题的人，1948年他任命松阳县长朱建新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事例。1949年春，共产党过长江，陈仪倾向共产党，阻止浙江省政府撤离杭州。

1948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占领了津浦线上的徐州、蚌埠，浙江的民众深感不安，陈仪宣布说他当采取适当措置保护浙江免于战火。他又宣布说不在钱塘江南岸修筑防御工事，而将国民政府为此所拨的经费，用于有利浙江人民的事业。1949年1月22日，蒋介石在宣布引退后回奉化途经杭州时，陈仪特设宴招待蒋介石，并着重表示浙省人民希望能避免战祸。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